

# 文史索隱

——晋唐文学杂考

姜剑云 著



人民  
文学  
出版  
社



文史索隐

——晋唐文学杂考

姜剑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装帧设计:姚 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姜剑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01-017063-3

I. ①文…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晋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894 号

### 文史索隐

WENSHI SUOYIN

——晋唐文学杂考

姜剑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75 千字

ISBN 978-7-01-017063-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一

中国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姜剑云先生长期苦冥思辨之成果《文史索隐》即将付梓，本人怀着喜悦与感激之心情收到此书原稿。本书以运用政治、文学与音乐的融合视角展开的对傅玄的论述，与以对儒道有深刻理解为基础的张华论断拉开了序幕，细细品读便有一种坠于七宝宫殿的感觉，每一处文字都闪着光发着声，它具有超越思考与形式的会合变通的视角。以此，先生在诉说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内含的高次元是会通性。

先生坚持此般会通性视角的同时，对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研究以及对唐朝政治家、诗人令狐楚的研究中也坚持着多焦点的视角。这简直就是用显微镜来对其文字逐一进行细致的分析，此般至极的细致更赋予了其研究史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谢灵运的研究，如果说通过对其著述考略来把握其学术大纲的话，那么论述其对《金刚经》与《华严经》等的编译过程，便是其对此般学术是如何理解的具体探究，又进一步阐明其与杜明师、慧远等诸多人物之师承与交游关系，来总体把握其学问成就以及人格形成，更是扩大了学问的振幅。

如果说立足于会通性视角的诸多论述反映了先生学问之广的话，那么对于特定人物的具体论述便说明了先生学问之深，先生的学问精神正是如此——渊博深奥。我对先生此般学问精神的来源进行了思考，经一番思考我

总结为：广猎群书。因为此书所有论述皆由对基本资料的批判式检讨而展开的。不论是对“三张”之父名的具体论断，还是对《文赋》与《三都赋》之撰年疑案新断以及令狐楚年谱的制定等，先生的此般学问精神都发挥无遗。即便如此，先生的文章依然行云流水、不失华丽，作为读者有一种痛快与畅阔之感。先生之文虽是客观的论述，却达到了一种美学的境界。

先生也揭示了中国与韩国间学问疏通的可能性。例如：考证谢灵运编译《华严经》，特别记录引用了新罗崔致远所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这是研究谢灵运佛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资料。在韩国，崔致远是被推崇为“东国文宗”而广泛流传的人物。先生之论述可谓是与我最研究的“朱子诗与《武夷九曲》被韩国受容的过程与其意蕴”正相反的研究成果。因为我是探寻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被韩国受容并阐明其文化意蕴的。

先生初拟书名为《古代文学杂考》。“杂”与“纯”互为反义，乍看上去好似有失系统性，最初收到先生之原稿我也如此认为，但却非也。此“杂”乃古人们长时间沉淀下的伟大思考，以“杂著”的形态包容而成之“杂”。因此，先生之“杂考”实为“纯考”，可谓“纯考而无杂”。正因如此，此书中有排除僵化之思考的自由思维，亦有确保深思之智慧游走。对于发现陆云之“清正而文弱”、谢灵运之独步一时的书画便可在此般脉络下理解。再者，此书更是取得了进一步的学术成果，以“新断”来揭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与新资料的发掘介绍等便可佐证。

读文可知人矣。通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心而扩充中国古代文学的深邃与宽广，以及在此赋予新意的论述中，我们可知先生之为人。与先生会面，可感知先生率直品性中的安逸，与先生论学，先生之严正伦理可使衣襟整肃。身为学者而两者兼得实为难矣，而先生两者具备。先生谈古论今之言辞醇厚，先生穿梭知识与实践的语言峻节，我便是在此与今世之古人相遇。先生便是生于现代而兼具古典之品格，有好古之心而具现代之眼界。

我作为韩国人是研究朝鲜时代文学的学者。就研究领域而言，先生与我

所研究的对象有中韩之空间差别，又有魏晋南北朝与朝鲜时代之时间差异。但是，我们一同探寻古典文学的同时并强化学问的时代应战力这一方向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中韩或者韩中文学方面进行疏通，亦可以构筑较大的东亚学问。在此过程中，我们作为学问上的同志可以教学相长，我们通过文学研究的实践可以发掘现世生活的真理。

为先生之大作献序，实乃污佛首之举。谨献拙文，在远方不负友情之托。

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教授 郑羽洛谨书

## 序 二

陶弘景

姜剑云教授新作《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搜罗期刊学报发表过的 27 篇论文，嘱我作序。初听其言，不以为意，以为顽笑话、客气语，不用特别认真。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始知必须严肃以对。

拜读全书之后，见其半数论文与谢灵运有关，方体会一个后生晚辈之所以会受到特别青睐，作者应当别有用心。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先生曾言：“唯独谢灵运，无论生前死后，古往今来，都是争议的对象，这就足以引起人们研究他的兴趣了。”话虽说得轻松，倘若论述不够谨慎，研究者甚至有可能受到研究对象谢灵运的牵连。不过，言犹在耳，放眼书中，读者便可看到了一篇谢灵运翻译《金刚经》的考证文章，内容新鲜少见，或许是为了符合“小考”之篇题，全文不过六百余字，结果，该文却刊于《文学遗产》这份重要期刊。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但这种少见的妙招，岂是我辈可以理解的！

我性本杂，我当然承认；孙昌武先生说我自许为“杂家”，这倒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究其实，我哪有资格称“家”呢？何况还是“自许”！于此，倘若把这个名号转送给姜教授，相信读者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书中所论，除了谢灵运，还有傅玄、张华、潘岳、潘尼、陆机、陆云、左思，此

外，还有令狐楚、马定国。综观全书布局，看似无心，其实应别有用意。试想，在六朝风流外，为何作者又把触角伸进了唐朝、金朝？尤其是少有人研究的马定国。今观这篇《马定国仕履与交游考论》，明显属史学的考证文章，架构很简单，也不啰唆，但其内容却纠正了现今学界惯用的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内容，顺流而下，当代的许多研究成果也都必须跟着修正；另外，其同时又指出《全金诗》这部当今文献整理成果的瑕疵，间接地提醒当代学者不要犯了同样的毛病。由此而观，这篇论文的企图，实非读者自其论题、架构所能想象的。这么看来，如果这不是“杂家”，还有谁有资格能够冠此名号？

《文史索隐》所收篇章，时隐妙招，又处处见宝。行文至此，回头审视书名这四个字，却只见平平淡淡，没有吸睛的词汇，没有耸动的文字，恐怕无法吸引现今口味刁钻的读者。至此，我们便不能不思考书名是否另藏深意了。

着实而言，“索隐”二字，最让世人熟知的，莫过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这部书首先连载于民国初年的《小说月报》，劈头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此类书籍，主要是延续“言志”的传统观点，希望突破小说文本的限制，将《红楼梦》背后所隐之事公之于世。由此看来，姜教授书名冠上了“索隐”两个字，大概也有同样的意思！不过，自《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批评为“笨谜”后，《文史索隐》应该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吧！我想，他至多只是希望提醒读者：其所研究的文本，不应该完全排除一些证据不够坚实的想法。然而，由于书中的妙招还真不少，其是否真的如此操作，我也只能猜测，还是必须靠读者自己阅读、品味才行。相信明理的读者们，应该还是会同意我的想法的。

是为序！

2016年元旦

## 序 三

乙未金秋，姜剑云先生寄来《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的清样，嘱我为序。万分惊骇之下，我当即致电，力辞其请。非我不恭，不敢奉命。窃以为，序向来是由德馨博学的贤达君子所为，非我愚钝之小辈能办。先生倒也通脱，不拘成说。在先生的勉励下，诚惶诚恐之心稍涣，尽力为作之意弥坚。

通读全书，思忖良久。其中意味，约略有三。

首先，《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是姜先生二十多年来沉潜文史、探赜索隐的生命年轮的文字记录。《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共收录 27 篇文章，这些文章均已公开发表。从发表的刊物与时间知，先生的索隐考证早在 24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二十多年间，先生与青灯相伴，畅游文史之间，排比众多材料，或新见时出的喜悦，或迷雾重重时的凝重，其情皆可想见。一个人经历了青春的青涩、中年的豁达与老年的慈祥，完成了生命的自然年轮。而学者却在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中，为生命年轮增加了质感。姜先生的生命年轮中，因有了与令狐楚、谢灵运、马定国，以及“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灵魂碰撞，多了生命体验的温度与厚度，从而变得丰富多彩。尽管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其实，生活中只要有诗意，就能使人幽居靡闷。姜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青灯相伴、探赜索隐的

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诗意呢？这种充满诗意的生命年轮结晶成了晶莹剔透的文字，使人不惧“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进而实现“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语）的自我期许。

赋诗曰：

留意史文灯下案，探赜索隐几多秋。

幽居靡闷千年事，金拣沙披成腋裘。

其次，《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不过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鳞半爪。虽多是考据之作，但他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将考据镶嵌在宏观的义理思辨之中。像太康时期的张华、张协、陆机、潘岳、潘尼等著述或生平考述，莫不为着揭示太康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进而思考文化风尚对作家的影响。再如对谢灵运著述、翻译，以及与佛教人士的交游等考辨，也是放置在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整体观照之中。就具体的考辨而言，其价值有二，一是求真以资后学。先生廓清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间诸多文士的生平、著述、交游等疑案，探求真相，足以嘉惠学林、深资后学。二是“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先生的系列考证文章，不仅是绣成的鸳鸯锦缎，更是金针走线度人的典范。他以腾挪跌宕的手段，飞针走线，来回穿梭。针脚细密，连缀得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充实而光辉，空灵而蕴藉。其中，《〈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一文，不仅以涸泽而渔的气势搜尽原始材料，而且完美运用逻辑学原则，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中的文章，或短或长，如风行水上，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长文覃思研精，深发未发之覆，而短文明了一事，精致可喜。为文之心与行文之道，亦足示范后学。故赋诗曰：

上穷魏晋下究元，二陆三张谢客贤。

线走针飞皆考辨，平地高楼稳如磐。

最后，先生将考据性质的文章辑成《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也是大有深意的。刊落论文体之虚词浮语，真义全出，倍觉亲切、灵动与率

真，充分体现了先生对西方意义的学术规范与述学体式的深刻反思。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参照西方学术建立起来的学术规范，已成金科玉律。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李泽厚语）的 90 年代，这套学术规范曾经切实规范了学术成果，形成了现代述学体式——学术论文与专著，推动了学术话语的生产，也改变了 80 年代的学术性格。然而，就学术论文而言，越来越重视形式规范，遮蔽起了性情、思想等。如今，人文学科领域的论文多成白茅黄苇。而另一种述学体——学术专著，强调专题性，以义理为尚，轻视考据；以精深专为尚，论域狭窄。先生的《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既非昔日学术论文汇编，也非专题性学术论著，既无论文的八股气，亦无专题研究的狭促气。虽不及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涉猎的范围广博，但考证之精细，求真之精神相仿佛。因此，《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势必将成为研究中国晋唐文学的必读书目。

赋诗赞曰：

学苑如今多靡靡，论文八股著述专。

浮词刊落留真义，嘉惠学林后世传。

李剑清

2016 年元月 18 日于古陈仓

# 前 言

宏观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划分出诸如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宋辽金元文学、明清文学等这样一些历史时段或学术方向。如果允许的话，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可简称为晋唐文学。这一阶段跨时约七百年，西晋、隋唐是其中的统一时期。晋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大转型时期，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题材与风格流派的大繁荣时期。晋与唐代表了这七个世纪文学发展史中的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姑且如此简称吧。

从学术史角度看，关于这七个世纪文学的研究，完全可以说，既广泛，也深入，简直就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应该说，拾遗补缺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拓展与挖掘的空间也还是有的。

先说西晋。西晋“文章中兴”，潘陆张左，功不可没。钟嵘《诗品》上品诗人总共才十一人，而西晋竟然占去了四席。可是关于西晋群才，学界争议的问题很多，比较集中的焦点有：如潘、陆、张、左的人品与文品问题，《文赋》、《三都赋》等重要作品的创作年代问题，种种这些，都是些聚讼纷纭的疑案。

再说刘宋。谢灵运为“元嘉之雄”。可是关于“元嘉之雄”，这位大写特写山水诗的重要诗人，我们都知道他的“玄言尾巴”，但我们还需要实质

性地解剖这条尾巴，并且要追问这条尾巴的来历。“玄言”中杂糅了儒道佛的成分，如要离而析之，学界关于佛的方面探讨，似乎欠债最多。谢灵运与佛门中人交游甚多，有慧远、慧严、慧观、慧琳、竺道生、昙隆，等等，他们各自门派来历究竟如何，谢灵运与他们的交往情形到底怎样，学界其实语焉不详。

又说大唐。要说关于初盛中晚唐文学的研究，那真可谓挖地三尺了。要找个有意味的研究专题，不夸张地说，是“难于上青天”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把关注的目光，盯住中唐宰相令狐楚的时候，就有重要的发现了。唐书列传中说他是“一代文宗”，他还编过《御览诗》，他与许多文臣如裴度、武元衡、权德舆等有唱和交往，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台阁诗人群体，一个雅正诗派。不仅如此，这个雅正诗派，竟然与当时以元白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和以韩孟为代表的怪奇诗派相互抗衡。中唐诗派群落的这一惊世奇观，很值得文学史家们认真研究和仔细玩味。

作家作品的疑案，有待于考证；文史奇观的揭示，源自于考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擅长于考证。我的大部分专题研究，都是从做年谱开始的。比如有《魏晋文学系年》、《中唐文学系年》、《谢灵运年谱》、《令狐楚年谱》等。《令狐楚年谱》做了六万多字，后来精简成一万多字，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做年谱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收获一些副产品，比如《“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著述考略》，发表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谢灵运著述考略》发表于韩国《东亚文献研究》；《令狐楚作品传流与散佚考述》发表于《晋阳学刊》，这一篇后来还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我的考证话题不是很丰富，除了上述的著作考述之外，主要有作家心路历程、作品创作年代、诗人交游情况等这样几个方面。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以微观的态度，弄清楚一个作家的重要作品的创作情形，把握住其思想个性的发展变化特点，同时又注意避免对单个作家的孤立研究，从而力求在立体的历史时空中，准确定位其文化坐标。这样做也会有重要的意外的发

现，比如我首先发现的中唐的“雅正诗派”、金代的“后怪奇诗派”，以及我首次提出的“中唐雅正诗派、怪奇诗派、通俗诗派既联合又争斗的三家鼎立”之说。

考证，并不是多么轻松惬意的活儿，有时甚至特别枯燥乏味。要肯坐冷板凳，有一份材料，方可说半句话。披沙拣金，未必就处处见宝。“诗家语”不必当真，“春秋笔法”或有隐情。文史研究，要咬文嚼字地解读作品文本，要追踪蛛丝马迹般地破译史料文献。“以史证诗”，兴许柳暗花明，“以诗证史”，小心闹笑话。文史索隐，寻寻觅觅，滋味杂陈，酸甜苦辣。

古人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之说，这三位一体中，“考据”位置很重要，不可偏废。应该说，求真务实，摒弃空疏，这是扎实为学的基本功，或者说是文史研究的前提。受此启发，关于文学研究，我在拙文《释“文学是人学”》中，对自己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则要求：朴学之手段，人学之思维，文学之本位，美学之眼光，哲学之境界。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 1 )   |
| 政治家、文学家与音乐家：傅玄考述 .....   | ( 1 )   |
| 亦儒亦道：张华考论 .....          | ( 10 )  |
| “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张协考述 ..... | ( 23 )  |
| 躁竞不已与亲情无限：潘岳考论 .....     | ( 31 )  |
| 安身而守正：潘尼考论 .....         | ( 43 )  |
| “太康之英”：陆机考论 .....        | ( 52 )  |
| 清正而文弱：陆云考述 .....         | ( 64 )  |
| “三张”父名问题新解 .....         | ( 71 )  |
| 左思《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      | ( 76 )  |
| 陆机入洛疑案新断 .....           | ( 87 )  |
| 陆机《文赋》撰年疑案新断 .....       | ( 99 )  |
|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著述考略 .....     | ( 108 ) |
| 陆机研究综述 .....             | ( 124 ) |
| 谢灵运著述考略 .....            | ( 145 ) |
| 谢灵运翻译《金刚经》小考 .....       | ( 152 ) |

|                       |           |
|-----------------------|-----------|
| 谢灵运润改《华严经》的一则资料 ..... | (154)     |
| “独步一时”的谢灵运书画 .....    | (156)     |
| 谢灵运与钱塘杜明师 .....       | (161)     |
|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      | (168)     |
|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 .....       | (193)     |
| 谢灵运与“黑衣宰相”慧琳 .....    | (207)     |
| 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 .....    | (219)     |
| 谢灵运与“头陀僧”昙隆交游考 .....  | (232)     |
| 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 .....       | (239)     |
| 令狐楚年谱简编 .....         | (245)     |
|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 .....    | (265)     |
| 马定国仕履与交游考论 .....      | (273)     |
| <br>参考文献 .....        | <br>(281) |
| 后 记 .....             | (285)     |

# 政治家、文学家与音乐家：傅玄考述

傅玄是魏末晋初重要作家之一，关于他的人生道路，我们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孤贫读书与东观修史阶段；第二阶段是追随与心向司马昭阶段；第三阶段是任职武帝朝阶段。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东南）人，生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其父傅幹时任丞相仓曹属，居于邳城。是年大疫，王粲、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一时俱逝”。至此，建安文坛的黄金时光已转为美好的历史记忆。建安文学时期和太康文学时期，是魏晋两朝文学发展的两次高峰；盛后再盛，中间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泰始元年（265）西晋立国的时候，傅玄四十九岁，乃“大易”之数，亦近“知天命”之年。他这半个世纪的经历，恰好成了关联建安末期与太康前夕的一根无形纽带。尽管他咸宁四年（278）去世时距太康元年（280）还有两年，但从文学事业上说，他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无疑是太康作家群体的前驱。

据《晋书》本传记载：“（傅）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又云：“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关于傅玄少年读书时期的情况，并无多少史料可以据以描述。《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谓傅玄之父“终于丞相仓曹属”，如此说来，则傅幹未及曹丕代汉便卒。若其卒